# 4世纪西北朝鲜地区主要民族集团的动向与势力格局

赵俊杰[1]　王新英[2]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长春 130012）

以乐浪郡为首的汉四郡自设立之日起，其盛衰就与周边各民族集团的动向息息相关，领地与人口不断变动，但总体呈现渐趋衰落的态势。带方郡的设立虽使汉文化势力一度中兴，却也仅是昙花一现，乐浪、带方二郡最终于公元313、314年相继被高句丽所灭亡。随着二郡的覆亡，整个西北朝鲜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为之一变，汉人集团逐步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这里重新成为各民族集团竞逐的舞台。本文试图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以汉人集团的兴衰为主线，探讨二郡灭亡后一个世纪内西北朝鲜地区汉、高句丽、百济、倭等各民族集团的动向和社会变化，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一、3世纪后叶——4世纪前叶西北朝鲜及其周边地区<br>汉人集团与高句丽集团的动向与社会局势

西晋武帝于咸宁二年（276年）复置平州，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五郡，护东夷校尉沿袭魏制，仍居襄平。此时乐浪郡仅统朝鲜、屯有、浑弥、遂城、镂方、驷望六县，户数3700，带方郡统七县，户数4900[1]。二郡户数总和不到东汉的1/7，人口锐减。乐浪郡领地进一步缩小，据池内宏的研究，此时乐浪已尽失大同江北之地，当为西晋泰始年间高句丽南侵之故[2]，相反，带方郡统县数与户数均超过乐浪郡，社会政治重心南移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晋书·地理志》在叙述魏、晋两朝平州属郡时，带方均位列乐浪之前，似也可以作为佐证。在乐浪北境面对高句丽南下的强大压力之际，带方南境虽也时刻面对韩族的侵扰，但仍能保持相对安定，因而带方郡尚能偏安一隅，可以想见，原乐浪郡汉人南迁带方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西北朝鲜地区发现大量纪年铭砖，且绝大多数出土于黄海南道，年代多在3世纪中叶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年代范围在3世纪70年代至二郡灭亡这段时期内的纪年铭砖有着集中的发现（表一），王、韩等原乐浪汉人大姓在铭文中也多次出现，说明此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迁至黄海道一带，同时，贯、杜、吴等不见于平壤周边墓葬或器物铭的姓氏也有发现，可能为新出现的姓氏，表明新的汉人也在不断流入，这一地区也逐渐成为4世纪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大的汉人聚居区。

表一　乐浪、带方郡故地出土的纪年铭砖（截止到二郡灭亡）

| 铭文内容 | 年代（公元） | 出土地 | 出处 |
|---|---|---|---|
| 光和五季韓氏造□ | 182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 | [3] |
| 興平二載四月貫式造壽 | 195 | 平安南道大同郡大同江面土城里土城 | [3] |
| 守長岑長王君君諱卿<br>年七十三字德彥東來黃人也<br>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師王德（？）造 | 248 | 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 | [4] |
| 嘉平二季二月五日起造 | 250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嘉平四年 | 252 | 黄海南道信川郡 Saenal-ri | [5] |
| 甘露…… | 256—260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景元元季七月廿三日 | 260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泰始四年三月日□□造 | 268 | 黄海南道信川郡加山面干城里 | [3] |
| 泰始七年四月 | 271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 | [3] |
| 泰始七年八…… | 271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 | [3] |
| 泰始十年七月廿三日造 | 274 | 平安南道大同郡大同江面 | [3] |
| 泰始十年杜奴村 | 274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 | [3] |
| 泰始十一年八月□（吳氏造塼） | 275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 | [6] |
| 咸寧元年三月造<br>五官掾作 | 275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咸寧元年三月十四日起造 | 275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咸寧五年三月六日乙丑造 | 279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太康元年三月六日 | 280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太康元年三月八日王氏造 | 280 | 黄海南道凤山郡 | [3] |
| 太康三年吳氏造<br>七月吳氏 | 282 | 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松山里 | [3] |
| 太康四季三月廿七日造 | 283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 | [3] |
| 太康四年三……<br>……三月昭明王長造 | 283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 | [3] |
| 太康四年三月□□□王朝 | 283 | 黄海南道三泉郡楸陵里 | [7] |
| 太康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作 | 286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太康七年三月癸丑作 | 286 | 黄海南道信川郡 | [3] |
| 君乙太康九年二月卒故記□<br>……月卒故記之 | 288 | 黄海南道安岳郡龙顺面柳雪里北洞 | [3] |
| 元康元年…… | 291 | 黄海道 | [3] |
| 元康三年三月十六日 | 293 | 黄海道 | [3] |
| 元康五年八月十八日乙酉造 | 295 | 黄海南道安岳郡龙顺面下云洞墓 | [3] |
| 大安二年…… | 302（386？）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土城里 | [3] |
| 永嘉……<br>季韓氏造塼 | 307—313 | 黄海南道信川郡南部面书院里 | [3] |
| 永嘉七年 | 313 | 黄海南道新院郡峨洋里土城（长寿山城 | [8] |

| | | | |
|---|---|---|---|
| | | 附近） | |

《资治通鉴·晋纪十》云：“*（孝愍帝建兴元年，公元 313 年）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9] 因此目前学界普遍以公元 313 年作为乐浪郡时期的终结。在高句丽攻陷二郡之前，出身辽东的张统已经占据二郡多年，说明在早些时候，乐浪、带方两郡似已名存实亡。导致二郡最终覆亡的原因有二，高句丽的进攻为外因，内因则是张统对二郡之地的主动放弃。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高句丽对乐浪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劫掠人口而进行的军事袭击，终极目的可能并不是“拓地”[10]，却恰好成为有名无实的乐浪、带方二郡灭亡的导火索，而汉人集团的主动撤退使得高句丽顺利地占领了二郡。

这一时期高句丽虽在南线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西线的扩张却遭遇到强大的阻力。西晋代魏后，沿袭公孙氏旧制，以平州刺史兼任东夷校尉。晋初担任该职者如傅询、何龛等人，均为一时英才，颇能制衡诸夷。金毓黻先生谓“是时东方之高句丽，西鄙之鲜卑慕容氏，沛然初兴，势锐莫当，然皆俯首就范，一听平州刺史之驱策……垂至四十六年，虽以永嘉之乱，而不受其影响”[11]，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至少说明 3 世纪末 4 世纪初东夷校尉的威望犹在，平州地域局势尚较为平静。4 世纪以后，慕容鲜卑强盛，不久尽有玄菟、辽东之地，始与高句丽接壤。319 年西晋平州刺史崔毖联合高句丽、宇文氏、段氏攻打棘城失败，成为慕容氏与高句丽冲突的开端[12]。此后二者屡屡互相侵伐，而慕容氏多有斩获，高句丽在西线战事中被动挨打，处于全面防守状态[13]。咸康八年（342 年），慕容皝率军出其不意地从南道进击高句丽，毁丸都而还，使高句丽再次遭受重创，遂称臣于前燕[14]，此后约 30 年的时间，高句丽应当处于休养生息阶段，鲜有战事，从《三国史记》在这段时间内仅有四条纪事，直到公元 369 年，才又重新出现高句丽主动出兵的纪事[15]推敲，我们可大略得之。

另一方面，尽管在灭亡之前，乐浪、带方二郡衰败之势就已不可逆转，但以高句丽当时的军事实力而言，想要攻而灭之却并非易事，战事“连年不解”即为明证。若非张统听从王遵建议，率二郡民众投奔慕容廆，战争恐怕还将持续。依前述《晋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晋时期乐浪、带方户数总和仅不足一万，却能抵御高句丽连年的进攻，汉人集团的战斗力可见一斑。但是，由于战争中人员的大量消耗和二郡灭亡后汉人的四处流徙，加之中原板荡，失去中央政府支持的残余汉人集团也无力发起反攻，因而在 4 世纪前叶至中叶，各方势力暂时处于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西北朝鲜的局势趋于缓和，残留在当地的汉人集团也得以迎来短暂的喘息之机。

## 二、4 世纪前叶—4 世纪后叶<br>黄海南道一带汉人集团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

### （一）带方郡及郡治位置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

历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已经基本摸清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乐浪时代遗存的分布状况，建立了遗迹、遗物类型与编年的基本框架。墓葬类型上，木椁墓在大同江、载宁江流域流行于西汉后期——东汉中期，而砖室墓则出现于东汉中期，至东汉末期开始流行[16]。值得注意的是，载宁江流域的黄海南、北道发现的砖室墓在绝对数量上并不比乐浪郡治所在的平壤市大同江南岸区域多，但其在各类墓葬中所占比例较高[17]，且黄海南、北道木椁墓发现极少，砖室墓开始大量出现的时间又与带方郡设置的时间基本相合，因而黄海南、北道一带很可能是带方郡的所在。黄海北道凤山郡文井面智塔里土城（唐土城）及其北侧 4 公里处“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凤山郡文井面胎封里 1 号墓）的发现，为带方郡治位置的推定提供了考古学资料[18]。

带方郡以及郡治位置的确定，对于研究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分布与盛衰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学界对此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可分为“汉城说”[19]与“唐土城说”[20]两派。“汉城说”在史学界较有影响力，该说以对文献的解析为出发点，认为“带水”为汉江，带方郡治位于汉城（首尔）附近，“唐土城”可能为带方郡南新县址，但该说的致命缺陷在于首尔或京畿道地区迄今尚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考古学证据。与其相反，持“唐土城”说的学者则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但对文献的解读与分析稍显论据不足，对胎封里 1 号墓“戊申”干支也存在“288 年”、“408 年”等不同认识。冈崎敬认为胎封里 1 号墓的年代为 348 年，“带方太守”铭文为墓主虚号，但对单纯依靠该铭文就断定唐土城为带方郡治的意见提出了含蓄的批评[21]。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更倾向于支持带方郡治“唐土城”说，但智塔里土城周边发现的汉文化遗迹从类型到数量都与乐浪郡治址——平壤土城里土城周边差距甚远，还有待于今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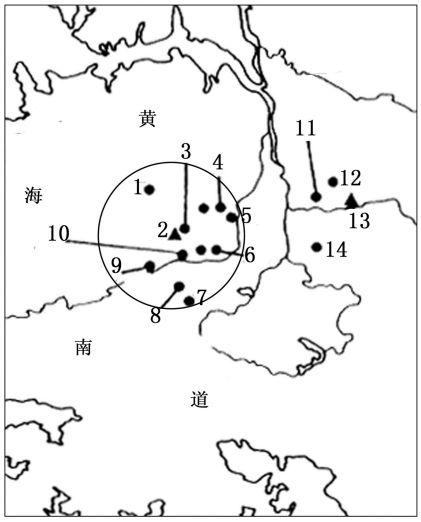
二郡灭亡后，纪年砖出土的地点基本集中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其他地区鲜有发现，可确知的年代从西晋永嘉七年（313 年）至东晋元兴三年（404 年）（表二），跨度近百年，表明二郡灭亡后应还有相当一部分汉人选择继续留在二郡故地。韩昇据此认为在乐浪郡灭亡前后，汉人已普遍由城市向边地南下迁徙[22]，实际却不尽然。信川郡业已发现的青山里土城址（原信川郡北部面信川土城）周长 1800 米，城内外发现砖、瓦、陶片等乐浪时期遗物，池内宏推定其为乐浪郡昭明县址[23]（旧南部都尉治所）。表一与表二中注明出土于信川郡北部面的 3—4 世纪纪年铭砖多出于该土城城内或周边，说明迟至 4 世纪该城仍在使用。调查中还发现“太康四年（283 年）三月昭明王长造”铭文砖，而带方郡设置之时，已不见昭明县之名。周振鹤通过对带方郡县名与乐浪郡原县名的比较，考证带方新出现的南新县为乐浪昭明县的改名，颇为精当[24]。由此可见，青山里土城址实为乐浪昭明县——带方南新县故址。从乐浪、带方灭亡后信川郡及周边地区汉文化遗迹的性质与分布看，遗迹地点绝大多数为墓葬，且处于一个以青山里土城为中心，半径约为 10 公里的圆形范围内，表明当时的汉人集团并没有放弃城市向边地转移，仍然有规模地居住在在青山里土城内或土城周围（图一）。

不少学者都曾指出，乐浪、带方灭亡后，流亡的汉人集团曾以黄海道为中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领”[25]。我们认为，这一“自治领”是为了抵御外族攻击，以亲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氏族大家为中坚力量，加上其他诸姓汉人集团而构成的共同利益联合体，称其为“聚居区”可能更为恰当。从上文的分析看，显然该汉人聚居区的核心区域为黄海南道信川郡及周边，青山里土城则是其中心城市。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各地的部分汉人也在“五胡乱华”的压力下，辗转逃往辽东，并经由辽东流徙至朝鲜[26]；同时，辽西、辽东等地也有不少汉人为躲避兵祸或政治迫害出奔朝鲜，有许多最终到达位于黄海南道的汉人聚居区。与此相对应，年代为 313 年以后的纪年砖中出现了分别代表西晋、东晋、后赵、后燕等朝代的年号，对于前二者的被采用，我们尚能以“奉正朔”来解释，而后二者的被采用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移民的出身地。

表二　乐浪、带方郡故地出土的纪年铭砖（二郡灭亡后）

| 铭文内容 | 年代（公元） | 出土地 | 出处 |
|---|---|---|---|
| 建興四年會景作造 | 316 | 黄海道 | [27] |
| 泰寧五年三月十…… | 327 | 黄海南道信川郡（旧龙门面）福隅里 2 号墓 | [27] |
| 咸和十年大歲乙未孫氏造 | 335 | 黄海南道信川郡社稷里 | [27] |
| 正邑太守張君塼<br>建武八年正邑太守 | 342 | 黄海南道安岳郡路岩里 | [28] |
| 建武九年三月三日王氏造<br>奉車…… | 343 | 黄海道 | [27] |
| 建元三年大歲……在巳八月孫氏造 | 345 | 黄海南道信川郡加山面干城里 | [27] |
| 建元三年…… | 345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 yajook-ri | [29] |
| 大歲在戊漁陽張撫夷塼<br>大岁（申）渔阳张撫夷塼<br>使君帶方太守張撫夷塼<br>赵主簿令塼懃意不卧张使君塼 | 348 | 黄海北道凤山郡文井面胎封里 1 号墓 | [27] |
| 建武十六年大歲…… | 350 | 黄海南道信川郡（旧龙门面）福隅里 8 号墓 | [27] |
| 永和八年二月四日韓氏造磚 | 352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 | [27] |
| 永和九年三月十日遼東韓玄菟太守領佟利造 | 353 | 平壤市平壤火车站内 | [30] |
| 元興三年三月二十日王君造 | 404 | 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 | [27] |
| 建始元季韓……<br>元季韓氏造磚 | 407/397（301？） | 黄海南道信川郡（旧龙门面）福隅里 5 号墓 | [27] |
| 建始元年…… | 407/397（301？） | 黄海南道信川郡（旧龙门面）福隅里 | [2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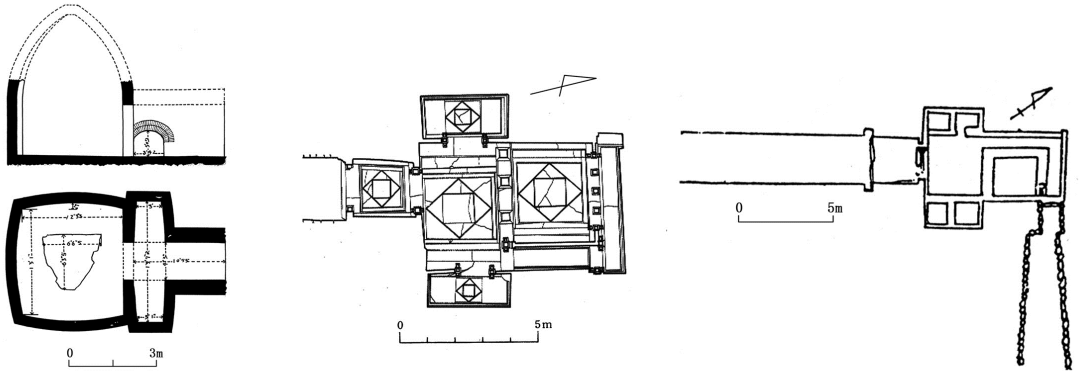



图一　二郡灭亡前后青山里土城周边乐浪汉文化遗迹分布示意图

1.信川郡用珍面柳川里 2.信川郡北部面青山里土城 3.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 4.安岳郡龙顺面下云洞
5.安岳郡龙顺面柳云里 6.信川郡加山面干城里 7.信川郡南部面凤凰里 8.信川郡南部面书院里
9.信川郡北部面福隅里 10.信川郡北部面社稷里 11.黄海北道凤山郡胎封里 12.凤山郡松山里
13.凤山郡文井面唐土城 14.凤山郡楚卧面养洞里

在以往调查与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多例 4 世纪中叶内地新移民的墓葬，前述的胎封里 1 号砖室墓墓室平面方形，四壁略外弧，上部内倾，推测为穹窿顶。墓门开于前壁中部，墓道两侧各有一耳室（图二：1），出土的铭文砖上有“大岁在戊”、“大岁在申”的干支纪年，与周边地区出土的 4 世纪前叶纪年铭砖的干支表述方法基本相同，田村晃一也认为该墓的年代以前述冈崎敬的观点较为妥当[31]，“渔阳张抚夷”铭文说明墓主为籍贯幽州渔阳郡的汉人，当为幽州迁至带方故地的汉人集团领袖。

安岳 3 号墓为带前、中（左右各有一侧室）、后室及回廊的多室墓（图二：2），墓葬形制与辽阳地区汉魏晋时期石室墓的渊源关系在学界已成共识。墓主冬寿在前燕官居司马，权位颇高[32]，由墓志铭可知其卒于东晋永和十三年（357 年），原籍幽州辽东郡平郭县都乡敬上里[33]。平壤驿内砖室墓墓主为佟利，“佟”与“冬”音通，可能与冬寿同族[34]。




1.胎封里1号墓　　2.安岳3号墓　　3.台城里3号墓

**图二　4世纪中叶汉人移民墓葬**

台城里 3 号壁画墓位于今南浦市江西区域，其形制与安岳 3 号墓基本相同（图二：3），时代也相近，二墓的墓主当有密切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将其推定为辽东移民的墓葬应无疑问。以台城里 3 号壁画墓为发端，至迟自 4 世纪中叶开始，已经有辽东移民迁徙至南浦市江西区域。往前追溯，南浦市江西区域台城里及其周边地区发现有零星砖室墓分布，其中台城里 5 号砖室墓的年代约为 3 世纪前叶[35]，被推定为乐浪郡黏蝉县址的城岘里土城[36]也相距不远。南浦市江西区域位于平壤西南，两面临海，在地理位置上与黄海南道安岳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推测，从 4 世纪中叶以来，江西区域附近很可能在逐渐形成又一个汉人聚居区，居民以内地新移民为主，而从汉系墓葬的数量与分布密度看，此时其规模尚小。5 世纪以后，包括德兴里壁画墓在内，该地区发现的汉系壁画墓数量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并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形制演变序列，这一地区也逐步取代黄海南道，成为汉人在西北朝鲜地区最大的聚居区。这部分内容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我们拟另文探讨。

不同地域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多样的地域文化，区别于当地传统的新的墓葬形态在带方郡故地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的境遇与同民族的纽带感也使得原二郡汉人遗民与汉人新移民之间的文化融合迅速展开，汉人聚居区的中兴之势也逐渐显露。

## （二）从出土铭文中的官职看 4 世纪前叶—中叶黄海南道汉人聚居区的发展

上述新移民墓葬的墓志铭、朱书题记与铭文砖，尤其是其中官职的名称为我们研究当时汉人集团的内部组织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孔锡龟认为安岳 3 号墓墓志铭中冬寿“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的官职并不具有现实的效力，为向乐浪、带方故地遗民夸示自身势力的自称，胎封里 1 号墓发现的“带方太守”与平壤驿内砖室墓发现的“辽东、韩、玄菟太守领”亦是如此，但也有附近地域当时已经形成庞大汉人势力的可能[37]。冈崎敬在将其与霍承嗣墓墓志铭[38]对比后，指出这些官职虽为散官，但符合晋制，朱书题记中出现的“帐下督”、“记室”、“小史”、“省事”、“门下抨”等官职亦与《晋书·职官制》中郡县官职相合[39]，表明冬寿集团完

全采用东晋的官僚体系。对于乐浪、带方郡遗民与自辽东南下的汉人而言，冬寿的官职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与发言权[40]。我们认为，暂且不谈这类官职是自封或是虚号，解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乐浪、带方灭亡后，二郡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瓦解，社会秩序陷于混乱，不论是残留于原居住地还是迁徙至新聚居区的汉人，在安定下来之后，都希望重建社会秩序，消除无政府状态下的恐慌情绪，恢复晋王朝原有的郡县形态，满足自身对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诉求。另一方面，一些有实力、有名望的汉族集团领袖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影响力，招揽与安抚流民，充实集团实力，争得在汉人集团内部的话语权，那么，寻求中央政府的承认，从而得到一个合法合理的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

随着西晋的灭亡，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早已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的控制，自然也愿意在当地扶植新的汉人势力，用较小的代价“回复旧土”，因此以东晋政府的立场而言，对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领袖的册封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这与册封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的羁縻政策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形式上看，二者却又如出一辙，尽管这些官职几乎均为散官，象征意义要远大过实际效力，但中央政府除授官职的高低与名义上的管辖范围不仅影响汉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地位与座次，也会对整个东北亚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从日后倭王屡次主动要求南朝政府册封“都督六国诸军事”，企图获取对朝鲜半岛南部控制权的合理名分的史实中可大略得之[41]。相应的，出于同样的目的，汉人集团领袖也必然会主动向中央政府要求被册封可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官职，而官职的高低、名义的管辖范围似乎与被册封者的出身、集团所在地的汉人来源及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表三　4 世纪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墓葬铭文中的官职

| 墓葬名（年代） | 墓主 | 原官职 | 铭文中官职 | 品位（依《晋书·职官志》） |
|---|---|---|---|---|
| 路岩里砖室墓（342 年） | 张□ | | 正邑太守[42] | “邑”太守当低于“郡”太守 |
| 胎封里 1 号墓（348 年） | 张□ | | 带方太守，“抚夷”可能为护抚夷校尉（护军？） | 护夷校尉第四品，郡太守第五品 |
| 平壤驿内砖室墓（353 年） | 佟利 | | 辽东、韩、玄菟太守领 | 郡太守第五品 |
| 安岳 3 号墓（357 年） | 冬寿 | 前燕司马 | 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 | 使持节都督第二品，平东将军第三品，护夷校尉、乡侯第四品， |

| | | | | |
|---|---|---|---|---|
| | | | 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 | 郡太守第五品 |

路岩里砖室墓出土铭文砖中的“正邑太守”官名不曾见于史料记载，自封的可能性较大，若将其理解为黄海南道这一汉人聚居区中某一邑的太守，则似乎说明该聚居区还可能有一套自身的官僚体系，社会组织结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胎封里 1 号墓涉及官职的铭文为“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以往学界将“抚夷”解释为护抚夷校尉[43]，也不排除为抚夷护军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抚夷”官职名表现出汉人集团领袖掌抚诸夷的姿态及凌驾于周边异民族之上的优越感。平壤驿内砖室墓铭文砖的“韩太守领”一职可能也是佟利假借中央授予的官职对韩族显示威慑力和正统性的表现。表三中后三座墓的官职表面上似乎存在重叠抵牾的现象，但却有从带方太守→辽东、韩、玄菟太守→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这样一个封号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4 世纪中叶汉人聚居区的发展与成长，这应当与乐浪、带方灭亡后三十年内兵乱较少，汉人集团的势力有恢复性的增长，以及 342 年慕容皝攻破丸都，高句丽自顾不暇，乐浪、带方故地受到的来自高句丽的压力减轻不无关系。表二所列举的乐浪、带方灭亡后出土的纪年铭砖绝大多数发现于 342—353 年之间，表明这期间砖室墓数量增加，相应的人口数量也必然有所增长，乐浪、带方故地的汉人势力在此时迎来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胎封里 1 号墓呈现典型砖室墓的构造风格，似乎也反映着汉人技术能力的逐步恢复。从冬寿官职的史无前例及其墓葬规模之庞大，壁画之精美可见，这种繁荣到 4 世纪 50 年代后半段冬寿去世之时可能达到一个相对的顶峰。此后，随着高句丽重又加强对南境的经营，汉人聚居区的安定被打破，黄海南道的汉人集团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 三、4 世纪后叶黄海南道一带汉人集团聚居区的衰落及周边主要民族集团的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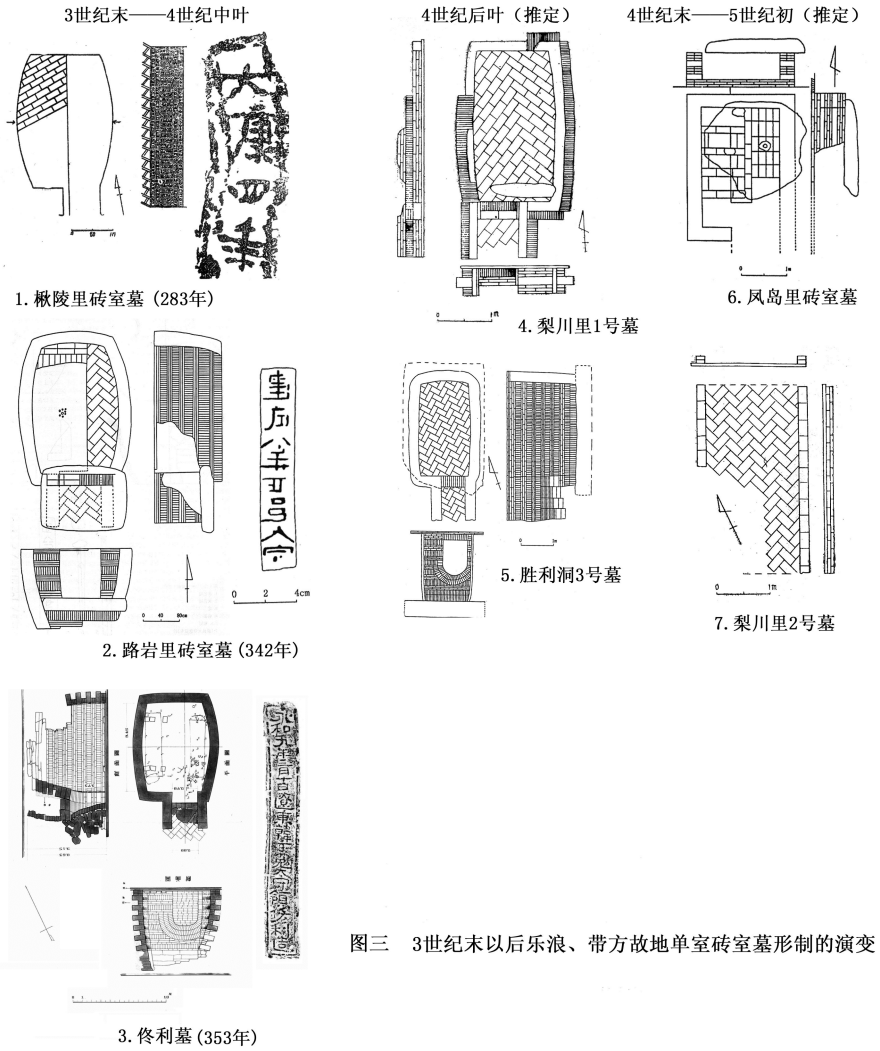
### （一）从砖室墓的石构化趋势看汉人势力的衰落

迄今在乐浪、带方故地发现的年代在 4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纪年铭砖仅有 3 例，其中福隅里墓群发现的两例年代还存在争议[44]（表二）。纪年铭砖主要发现于墓葬，其数量的锐减表明当时的汉人社会已经无暇，甚至无力为死者烧制铭文墓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砖室墓数量急剧减少的事实。实际上，砖室墓从数量到构造上的衰落态势从 3 世纪中叶起就已经显现。

3 世纪中叶以后，以凤凰里 1 号墓[45]（王卿墓，248 年）为代表的石盖平天井砖室墓开始登场，与所谓“典型砖室墓”[46]并行；平面呈“吕”字形的二室墓逐渐消失。至 3 世纪

末，单室砖室墓占据主流，墓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墓室前后两壁平直（有的后壁略弧），左右侧壁弧出，壁面大多抹白灰，墓道完全偏于前壁左侧。发现纪年铭砖的黄海南道安岳郡楸陵里砖室墓[47]（283 年）、安岳郡路岩里砖室墓[48]（342 年）以及平壤驿内砖室墓[49]（佟利墓，353 年）尽管年代跨度较大，但墓室平面形态上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从顶部形态看，楸陵里砖室墓被推测为砖构穹窿顶，路岩里砖室墓为石盖平顶，佟利墓为石构穹窿顶，显示出 3 世纪中叶——4 世纪中叶砖室墓的发展尚较平稳，但总体呈现顶部用材石材化比重加大的趋势。由此可知，313 年二郡的灭亡对砖室形制演进趋势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其分布地域及数量的变化造成直接影响，表一与表二中乐浪、带方二郡灭亡前后纪年铭文砖数量发现不多也可作为佐证。至 4 世纪中叶，以胎封里 1 号墓与平壤驿内砖室墓为代表的穹窿顶砖室墓又有所抬头，虽说明汉人势力的一时繁盛，却也只是回光返照，且平壤驿内砖室墓的穹窿顶已经采用石材构筑，墓葬石筑化的倾向愈加明显。我们认为，用砖构筑穹窿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烧砖匠人与修墓匠人的密切配合，缺一不可。砖室墓石盖平顶的出现与流行，正反映出砖构穹窿顶技术的逐步丧失，当为烧砖与修墓匠人的减少所致，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二郡汉遗民的大量出逃。4 世纪后叶开始，大同江流域的墓葬类型出现分化，典型砖室墓消失，砖石混筑墓的演变脉络则可大致归纳为两条主线。

其一，石盖平顶砖室墓继续存在，但其形制从 4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平壤乐浪区域胜利洞 3 号砖室墓[50]四壁近平直，仅稍有外弧，上部略内倾，平壤寺洞区域梨川里 1 号墓[51]平面形态亦是如此；平壤圣湖区域凤岛里砖室墓[52]则墓室四壁壁线平直，上部未见内倾，梨川里 2 号墓[53]也有着与凤岛里砖室墓相同的平面形态。将前述三座纪年砖室墓与后二者相比较后，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砖室墓的形制演变趋势：左右两侧壁向外弧曲度逐渐减小至竖直，四壁上部内倾程度逐渐减小至竖直，地面铺砖由人字纹铺法逐渐转向横竖相间铺法，墓砖的纹样也逐渐简化消失。胜利洞 3 号墓与梨川里 1 号墓的年代当晚于佟利墓，可能约为 4 世纪后叶，而凤岛里砖室墓、梨川里 2 号墓的形制与平天井石室墓相似，代表了砖室墓的最晚期形态，年代可能约为 4 世纪末 5 世纪初（图三）。总体上看，4 世纪中叶以后，砖室墓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衰落过程。后继的贞柏洞 101 号墓[54]以砖状石材筑壁，地面铺砖但工艺生涩，天井形态已经演化为简单的平行、抹角叠涩结构。




图三　3世纪末以后乐浪、带方故地单室砖室墓形制的演变

其二，形制上继承典型砖室墓的穹窿顶砖石混筑墓墓葬用材中石材比例不断提高，用砖不断减少。佟利墓墓底铺砖，四壁砖筑，但壁体接近顶部位置处已经采用砖状石材构筑，穹窿顶也用石材构筑，而南井里 119 号墓[55]已经是典型的穹窿顶石室墓。

很明显，两条主线虽演变过程不尽相同，但却均有墓葬用材从砖到石，以及砖室墓因素逐渐减弱，石室墓因素逐渐增强的趋势。墓葬类型的分化，说明此时期汉人集团内部匠人的缺失对墓葬构造的影响进一步显现，但这是否表明墓主分属于不同的汉人集团也有待进一步探讨，高久健二即从凤凰里 1 号墓墓主籍贯东莱出发，认为石盖顶砖室墓的墓主可能包含公孙氏统治时期至乐浪、带方二郡灭亡后新出现的新兴豪族[56]。总之，不同的墓葬发展脉络最终却殊途同归，加之铭文砖数量的锐减，无疑如实地反映了 4 世纪后叶——5 世纪初砖室墓的衰落，而用砖传统的逐渐削弱与丧失，也正是此时期二郡故地汉人势力趋于衰微的写照。

## （二）4 世纪后叶以后西北朝鲜主要民族集团的动向及高句丽对平壤控制权的最终确立

4 世纪 60 年代以后，高句丽国力有所恢复，在向前燕称臣纳贡，积极修复关系[57]的同

时，开始重新着手对西北朝鲜地区的经营。起初高句丽在与百济的战事中处于下风，故国原王也在平壤保卫战中身亡[58]。370 年前秦灭前燕，高句丽将前燕太傅慕容评执送于秦[59]，遂与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西线威胁的解除，使高句丽得以免去后顾之忧，专注于南线作战，此后战局逐渐向着对高句丽有利的方向发展[60]。高句丽的重新南下势必不断压缩残留于乐浪、带方故地汉人的活动空间。二郡灭亡后，残留在故土的汉人势力已经孤立无援，虽然聚众自保，形成上文所述的共同利益联合体，但这种联合体本身的联盟性质决定了其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容易被各个击破。3 世纪后叶，乐浪、带方二郡户数总和仅为 8600 户，又历经 4 世纪初的兵乱，此时黄海南道信川郡附近的汉人聚居区人口数应当大不如前，其他汉人聚居区的人口更是只少不多，纵然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有恢复性的增长，但仍无法抵御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另一方面，4 世纪后叶百济积极的北进态势对带方故地汉人的影响也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有关其与高句丽战争的文献上已列举，此处不再赘述。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尚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日帝时期调查者于黄海北道黄州郡收集到的一批百济陶器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批陶器包括高杯、盖、盘、甑、长卵形陶器等五大类 13 件，均与汉江流域发现的典型百济陶器器型相同，年代约为 4 世纪中叶前后[61]。更重要的是，这些陶器均为生活用器，当出土于生活遗迹，据此可以推断当时黄州地区可能有百济人居住[62]。

与之相关的是，在平壤之战的第二年，即公元 372 年，百济首次遣使入东晋朝贡，并获封“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之职[63]，“乐浪太守”当为百济主动要求册封的官职，而“领”字更耐人寻味，使百济对当时尚未实际控制乐浪地区而又觊觎前乐浪郡治平壤城的急切野心昭然若揭。反过来看，封号与实际领地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也不能排除当时百济势力已渗透至黄州地区，或是更北的乐浪故地，距平壤仅咫尺之遥的可能，那么 4 世纪 70 年代高句丽南进的一度受挫便有了考古学和文献的依据。黄州距平壤 35 公里，距黄海南道信川郡也仅数十公里，此处若成为高句丽与百济交战的前沿，必定对信川郡周边的汉人聚居区造成极大的震动与影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4 世纪后叶黄海南道附近纪年铭砖及砖室墓剧减的原因了。

韩昇在研究当时汉人集团动向时指出，在面临覆灭的危险下，汉人再次面临或走或留的艰难抉择，出现或举家逃亡，或一个氏族分为数枝，一枝暂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几枝各自奔向不同目的地，积极寻找退路的情况[64]。今西龙以乐浪王氏为研究对象，指出乐浪、带方灭亡后，王氏后裔流入百济与高句丽者颇多[65]，《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 年）记录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表生动地描述了 5 世纪初朝鲜汉人迁徙至日本的经过[66]，《新撰姓氏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67]，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的记载或许正是当时倭王遣人前往带方故地迎接准备移居日本的汉人的真实写照。

上文我们提到，高句丽故国原王于 371 年在平壤保卫战中战死，实际上表明高句丽至迟在 4 世纪 70 年代已经完全控制了平壤，这不同于以往简单的军事侵略，而是完全意义上的

领土扩张。377 年再次击退百济对平壤的进攻并展开反击后，高句丽已经扭转了南线的战局，至广开土王即位当年（391 年），高句丽军攻陷百济关弥城[68]。对关弥城位置的考证显示高句丽南境已逼近汉江北岸[69]，这使得平壤地区的安全威胁逐渐解除，高句丽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随之展开，广开土王于执政的第二年在平壤兴建九寺即为明证[70]。高句丽文化因素的不断导入，必然与当地旧有的汉文化因素碰撞、融合，逐渐动摇汉文化的主导地位。

目前发表的石盖顶砖室墓与早期石室墓多集中分布于平壤及其周边，容易使人产生该区的墓葬演进一枝独秀的判断。但从安岳郡路岩里发现的石盖顶砖室墓以及黄海南道信川郡干城里与凤山郡发现的与南井里 119 号墓构造相似的石室墓[71]看，载宁 江流域的信川郡及其周边地区可能也保持了与平壤地区基本一致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代表砖室墓葬制系统的原二郡汉遗民社会在西北朝鲜地区的衰退已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在砖室墓石室化的浪潮下，来自内地，代表石室墓系统的汉人新移民则成功地扎根于此，并已显露势力逐渐壮大的态势，冬寿集团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大同江下游的南浦市江西区域一带虽然墓葬发掘不多，但台城里 1 号墓与安岳 3 号墓在形制上的密切关系，将会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地区 4 世纪后叶—5 世纪初汉人新移民的动向与分布，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汉人新移民社会的面貌。

## 四、结语

囿于材料，目前尚无法全面把握 4 世纪大同江、载宁江流域主要民族集团动向与势力变化的全貌，但以 4 世纪初—4 世纪后叶的黄海南道信川郡地区，以及 4 世纪后叶—5 世纪初的平壤地区为缩影，我们还是能够大致勾勒出乐浪、带方二郡灭亡后一个世纪内，在高句丽南进的军事压力及其与百济争雄的大背景下，以砖室墓葬制为代表的二郡汉遗民文化在二郡故地渐趋衰落但仍顽强延续的图景。随着二郡汉遗民的不断出逃，在汉人集团内部以石室墓葬制为代表的内地汉人新移民渐显勃兴之势，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独立发展。与此同时，高句丽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逐步实现了西线边境的安定，在南线则成功遏制了百济的北上势头，并将实际控制区域向南逼近至汉江北岸。4 世纪的晚些时候，倭在将势力渗透至朝鲜半岛南部后，也试图加入对西北朝鲜地区的竞逐，虽很快遭到了高句丽的打击，但却成功地将大批出逃的汉人引渡回国，为国内生产力的飞跃提供了契机。

4 世纪末以后，随着高句丽政治重心的南移，高句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与西北朝鲜地区既有的汉文化的碰撞、交织与融合逐渐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旋律，随着 427 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大同江、载宁江流域也加速进入了社会的转型期。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0&ZD085）与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2011QG006）研究成果。

# 注 释

[1] 晋书[M]地理志：“……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

[2] 池内宏．乐浪郡考[J]．满鲜史研究上世编[M]．吉川弘文馆，1951：55～59．

[3] 梅原末治．乐浪·带方郡时代纪年铭砖集录[J]．昭和七年度古迹调查报告[M]．1933．

[4] a：田畴农．信川发现的带方郡长岑长王卿墓[J]．文化遗产，1962（3）．

b：都宥浩．王险城的位置[J]．文化遗产，1962（5）．

[5] Yun Song-hak．黄海南道信川郡 Saenal-ri 砖室墓发掘报告[J]．朝鲜考古研究，2004（4）：39～43．

[6] 三上次男．乐浪郡社会の支配构造と土著社会の状态[J]．古代东北アジア史の研究[M]．吉川弘文馆，1966：42．但三上次男原引的梅原末治论文（注释[3]）中并未有该件铭文砖著录．

[7] 安炳灿．新发现的楸陵里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1990（1）：43～45．

[8] 安炳灿．关于长寿山一带的高句丽遗迹遗物[J]．朝鲜考古研究，1990（1）：7～11．

[9] 资治通鉴[M]卷八八晋纪十孝愍帝建兴元年条．

[10]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条：“十四年，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

[11] 金毓黻．东北通史[M]．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45：127．

[12] 晋书[M]载纪第八：“时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以分其地。三国伐廆，攻棘城，廆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于是二国疑宇文通于廆，引兵而归．” 而三国史记[M]记载的慕容氏与高句丽之间冲突最早的开始时间早于晋书[M]．参见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五烽上王二年、三年条．

[13] 晋书[M]载纪第八“明年（太兴三年），高句丽寇辽东，廆遣众击败之．”

资治通鉴[M]卷九十一：“太兴二年十二月，廆以其子仁镇辽东。高句丽将加奴子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袭擒之……高句丽数寇辽东，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丽王乙弗利逆来求盟，翰、仁乃还。三年十二月，高句丽寇辽东，慕容仁与战，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资治通鉴[M]卷九十六：“咸康四年，赵王虎以船三十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以谋击燕。五年，皝击高句丽兵，及新城，高句丽王钊乞盟而退。六年，慕容恪镇平郭，屡破高句丽兵，高句丽畏之，不敢入境。”

[14] 资治通鉴[M]卷八十九：“（咸康八年）十一月，皝自将兵四万出南道……高句丽兵大败……遂入丸都，钊单骑走……发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

[15]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十三年至三十九年条．

[16] 较为详细的编年图参看高久健二．乐浪古坟文化研究[M]．学研文化社，1995：173 图 15．

[17] 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7：13．

[18] 智塔里土城参看：

a：谷井济一．黄海道凤山郡、平安南道顺川郡及平安北道云山郡古迹调查略报告[J]．大正六年度古迹调查报告[M]．朝鲜总督府，1920．

b：关野贞等．朝鲜古迹图谱一[M]．朝鲜总督府，1915：图一三〇．

胎封里 1 号墓参看关野贞等．朝鲜古迹图谱一[M]．朝鲜总督府，1915：图一三四～一五五．

[19] 持“汉城说”观点的主要学者及论著参看：

a：池内宏．乐浪郡考[J]．满鲜史研究上世编[M]．吉川弘文馆，1951：47～51．

b：驹井和爱．乐浪[M]．中央公论社，1972：52～56．

c：西本昌弘．带方郡治の所在地と辰韩廉斯邑[J]．朝鲜学报（130）：37～66．

[20] 持“唐土城说”的学者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带方郡原郡治在汉城，西晋后迁至“唐土城”，参看：

a：谷井济一．黄海道凤山郡ニ於ケル汉种族ノ遗迹[J]．古迹调查略报告[M]．1913．

b：关野贞．朝鲜美术史[J]．朝鲜の建筑と艺术[M]．岩波书店，1941．

另一派则认为带方郡治自始至终均为“唐土城”，参看：

a：梅原末治，藤田亮策编著．朝鲜古文化综鉴第二卷乐浪乾[M]．1948：8～9．

b：青山公亮．带方郡考[J]．朝鲜学报（148）：277～286．

[21] 冈崎敬．安岳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J]．史渊（93）：66～67.

目前胎封里 1 号墓“戊申”干支为“348 年”说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22] 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M]．文津出版社，1995：142．

[23] 池内宏．乐浪郡考[J]．满鲜史研究上世编[M]．吉川弘文馆，1951：46～47．

[24]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人民出版社，1987：209．

[25] a：小田省吾．朝鲜史大系上世史[M]．东京，1927：25．

b：冈崎敬．安岳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J]．史渊（93）：62～63．c：金元龙．韩国考古学概说[M]．一志社，1986：155．

[26] 也不能排除从山东经由海路抵达的可能性．

[27] 同[3]．

[28] 韩仁德．路岩里石天井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2003（3）：35～40．

[29] 国立中央博物馆．乐浪[M]．Sol 出版社，2001．

[30] 野守健，榧本龟次郎．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调查报告[J]．昭和七年度古迹调查报告[M]．1933．

[31] 田村晃一．乐浪北部的砖室墓[J]．乐浪と高句丽の考古学[M]．同成社，2001：188～189．

[32] 冬寿的事迹与出逃始末参看晋书[M]载纪第九慕容皝与资治通鉴[M]卷九十五晋纪咸康三年．

[33] 晋咸康二年后，辽东郡属平州，此处仍记为幽州．

[34] 冈崎敬．安岳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J]．史渊（93）：65．

[35] 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7：30～31，84～85．

[36] 关野贞，谷井济一等．乐浪郡时代の遗迹第三编[M]．古迹调查特别报告第四册，朝鲜总督府，1925．

[37] 孔锡龟．平安·黄海道地方出土纪年铭砖研究[J]．震檀学报（65）：25．

[38] 霍承嗣墓墓志铭为：“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嶲、兴古三□□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君讳□，字承嗣。卒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太元十□□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葬。”参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3（12）：1～6．

[39] 晋书[M]职官志：“郡皆置太守……又置主簿、主记室、门下贼曹议生、门下史、记室史、录事史……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檄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

[40] 冈崎敬．安岳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J]．史渊（93）：65～66．

[41] 参见宋书[M]东夷传倭条．

[42] 原报告作“西邑太守”，参看韩仁德．路岩里石天井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2003（3）：35～40．

[43] 冈崎敬．安岳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J]．史渊（93）：66．

[44] 田村晃一通过对福隅里墓群墓葬布局与出土纪年铭砖的综合考察，认为“建始元季”铭可能为晋赵王

伦建始元年（301 年），从而揭示了福隅里墓群诸墓葬的年代早晚与布局的关系。由于福隅里墓群没有发表墓葬线图，从目前看，这一结论最为合理。参看田村晃一．乐浪北部的砖室墓[J]．乐浪と高句丽の考古学[M]．同成社，2001：191．

[45] a：田畴农．信川发现的带方郡长岑长王卿墓[J]．文化遗产，1962（3）．

b：都宥浩．王险城的位置[J]．文化遗产 1962（5）．

[46] 典型砖室墓指完全用砖构筑墓室的砖室墓．

[47] 安炳灿．新发现的楸陵里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1990（1）：43～45．

[48] 韩仁德．路岩里石天井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2003（3）：35～40．

[49] 野守健，榧本龟次郎．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调查报告[J]．昭和七年度古迹调查报告 1 [M]．朝鲜总督府，1933．

[50] Kim Jae-yong，Ko Young-nam．最近发掘的石盖顶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2002（3）：32～37．

[51] 车达满．梨川里 1 号、2 号砖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2003（3）：30～34．

[52] 同[50]．

[53] 同[51]．

[54] 李淳镇．乐浪区域一带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J]．朝鲜考古研究，1990（4）：2～9．

[55] 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王光墓第三章，朝鲜古迹研究会古迹调查报告第二册[M]．1935．

[56] 高久健二．乐浪砖室墓の研究——砖室墓の分期、编年および诸问题の考察[J]．第 33 回韩国上古史学会学术发表大会——乐浪的考古学[C]，2005：146．

[57]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条：“二十五年……冬十二月，王遣使诣燕，纳质修贡，以请其母。燕王雋许之，遣殿中将军刁龛送王母周氏归国，以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王、公如故．”

[58]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条：“三十九年，秋九月，王以兵二万，南伐百济，战于稚壤，败绩……四十一年，冬十月，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城，王出师拒之，为流矢所中，是月二十三日薨”此平壤城为此后高句丽移都之平壤，学界已有共识．

[59]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条：“四十年，秦王猛伐燕，破之，燕太傅慕容评来奔，王执送于秦．”

[60]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条：“五年……秋七月，攻百济水古城。六年冬十一月，侵百济北鄙．”

[61] 崔钟泽．黄州出土百济陶器例[J]．韩国上古史学报（4）：334．

[62] 崔钟泽．从考古学看高句丽的汉江流域进出与百济[J]．百济研究（28）：157．

[63] 晋书[M]简文帝纪：“咸安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王各遣使贡方物……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

[64] 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M]．文津出版社，1995：144．

[65] 今西龙．大同江南の古坟と乐浪王氏の关系[J]．朝鲜古史の研究[M]．近泽书店，1970：281．

[66] 续日本纪[M]延历四年六月癸酉条：右卫士督从三位兼下总守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等上表言：“臣等本是后汉灵帝之曾孙阿智王之后也。汉祚迁魏，阿智王因神牛教，出行带方，忽得宝带瑞，其像似宫城，爰建国邑，育其人庶。后召父兄告曰：‘吾闻东国有圣主，何不从归乎。若久居此处，恐取覆灭。’即携母第迁兴德及七姓民规划来朝……于是阿智王奏请曰：‘臣旧居在于带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艺，近者寓于百济、高丽之间，心怀犹豫，未知去就。伏愿天恩遣使追召之。’乃敕遣臣八腹氏，分头发遣，其人民男女，举落随使尽来，永为公民．”

[67] 新撰姓氏录[M]山城国诸蕃条：“秦忌寸，太秦公宿祢同祖，秦始皇帝之后也。功智王、弓月王，誉田天皇（谥应神）十四年来朝，上表更归国，率百二七县伯姓归化．”参照日本书纪[M]应神纪十四年条：“臣，领己国之人夫百廿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弓月君当自百济经新罗前往日本．

[68]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条：“（元年），冬十月，攻陷百济关弥城。其城四面峭绝，海水环绕……”

[69] 田中俊明先生认为，关弥城即为广开土王碑碑文中永乐八年夺取的五十八城中的“弥邹城”，从该城的地势出发，将其比定为临津江与汉江交汇处的坡州郡炭县面乌头山城较为妥当．参看田中俊明．高句丽の平壤迁都[J]．朝鲜学报（190）：33．庆熙大学曾对乌头山城进行过部分发掘，成果参看 Huang Young-hoon 等．乌头山城[M]．庆熙大学校考古·美术史研究所，1992．

[70] 三国史记[M]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条：“二年……创九寺于平壤．”

[71] 梅原末治，藤田亮策．乐浪の墓制[J]．乐浪坤[M]．朝鲜古文化综鉴[M]第三卷，养德社，1948：76．材料未发表．

## On the Movement of Main Nation Groups and Power Pattern in Northwestern Korea in 4th Century

Junjie-Zhao　Xinying-Wang

**Abstract:** In the end of 3rd century, along with the Koguryeo force going south, the Han group originally lived in Lelang had presented a trend of southward movement to Daifang. What is more, in the first half of 4th century, the ruin of Lelang and Daifang exacerbated the Han to escape southward. The exiled Han group gathered settlements gradually in the north of Hwanghae-namdo in the old haunt of Daifang. Furthermore, just at the same time, new Han immigrants moved here from the northern continent of China continuously, the power of the Han group had ever been flourishing for a short time. In the second half of 4th century, Koguryeo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n the south frontier again; Baekje force had ever overspread Hwanghae-pukto at that time. Then the Han group was awfully struck, and a great deal of people escaped away once more. Taking this chance, the old Japanese set foot in the northwestern Korea. After had driven the power of Baekje and that of the old Japanese out of the northwestern Korea in succession, Koguryeo completely dominated this area at the end of 4th century finally.